

遊走於傳教士與漢學家之間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新教傳教士漢學著作綜述\*

吳莉葦\*\*

摘 要

本文是對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圖書館「歐美漢學研究」圖書計劃下之一部分英文著作的內容綜述，特選十九、二十世紀之間曾在中國任傳教士而又對西方漢學學科發展有重要價值的作者。所錄作品數量比之整個漢學主題的書籍總量雖是九牛一毛，但足以藉之認識新教傳教士在漢學發展中的開創性地位，對於了解漢學在特定時期的特定面貌也有提綱性作用。

關鍵詞：新教傳教士、漢學、中西文化交流

---

\* 本文寫作獲兩岸清華「漢學的典範轉移」合作研究計劃資助。

\*\*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

「西方漢學」，無論是作為一個學科領域，還是作為文化交流的一種形式，都有諸多值得探討的議題，這也正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推進「歐美漢學研究」圖書計劃的曲衷之一。此計劃的購書進程尚未最終完成，目前人社院圖書館在列的圖書為「英國漢學研究」部分，實際是「英文漢學研究」，兼有幾部中文作品，總記錄 1496 條，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仍處於購置進程中。就已經在館的圖書而言，計劃主持方希望能早日為這些書籍完成分類提要，以促進同儕對相關領域之關注。但書籍所屬年代從十八世紀直至當今，且作者類別與主題類別皆繁雜多方，無法憑一人之力畢其功於一役。故此文所述列之作品，僅針對一個特殊群體，即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期曾在華活動並撰寫有漢學作品（限於館藏，為英文）的一批新教傳教士。筆者所為，拋磚引玉，乞望眾先進後學可共襄盛事，以不使美玉窖藏無光為旨。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活躍於中國的新教傳教士中，有一批後來成為中國文化的研究先驅，甚或執教於中國、歐洲或北美的大學及其他教育機構，並且撰寫過有關中國文化的西文專著。這一批兼具宗教關懷與學術興趣的特殊人群認識中國文化時的特點及其在中國文化西傳和漢學學科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都值得關注。他們的認識無疑會深刻影響早期學習中國文化的本土西方人，對於探討西方的中國觀這一普泛性問題以及漢學典範的形成與變化這一特定問題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 一、作者簡介

何為「漢學家」，在中國研究剛剛開始作為一個學科漸

次於各大學落戶的年代，委實難以作專精定義。而糾纏於一個人有無資格被稱為「漢學家」這樣的議題，對於研究者而言也並非必要之舉。以筆者多年來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感受判斷，反倒是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為西方世界針對某一領域之中國研究發揮石礎、梁材之效，可以頗為明白地作為其是否「漢學著作」之標準。職此之故，有一類傳教士雖致力於向中國介紹西方文化，留下不少此類主題的中文著作，但沒有突出的西文著作論述中國，故他們的作品就不是本文的考察對象。還有一類傳教士旅行中國各地並撰寫見聞錄與行紀，僅泛泛描述風土人情或傳教經歷，此類作品數量雖多，卻也略而不論，如內地會諸人的眾多作品。因此，不少非常有名的傳教士並不在本文涉論之列。同時，本文只能針對文章撰寫時已經在館的圖書而論。經過撰著時間、作者身份、內容衡量和是否在館這些條件的共同篩選，上千條目中筆者只能挑出三十三部作品加以介紹，出自十八位作者。他們是（按首次來華時間先後排列）：

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 1812-1884），1833-1877年在華，美部會（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傳教士。1848-1851年編輯《中國叢報》，1860-1876年任美國駐華公使館（北京）臨時代辦，1877年返美後任耶魯大學漢學教授。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1843-1856年在華，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墨海書館創建人之一，1853年在香港創辦《遐邇貫珍》。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43-1873年在華，倫敦傳教會傳教士，晚年任牛津大學中文教授。

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1843-1905年在華，倫敦傳教會傳教士，墨海書館創建人之一，1875年獲愛丁堡

大學神學博士，1880 年被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聘為海關翻譯。

波乃耶 (James Dyer Ball, 1847-1919)，1844-1919 年在華，美部會傳教士。

丁韞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1850 年來華，美北長老會 (美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傳教士，長期任京師同文館負責人，1898 年起任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

畢爾／比爾 (Samuel Beal, 1825-1889)，英國牧師和東方學家，作為英國海軍的隨軍牧師於 1856-1858 年到過中國。

麥高溫 (John Macgowan, ?-1922)，1860-1910 年在華，倫敦傳教會傳教士。

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1865-1899 年在華，起先為德國禮賢會 (Rhenish Mission) 傳教士，1880 年與禮賢會脫離關係，獨立傳教，1885 年加入同善會後先後在上海和青島活動，被譽為「十九世紀最高深的漢學家」。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1870-1916 年在華，英國浸信會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1891-1916 年任廣學會總幹事，1902-1916 年任山西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

林輔華 (C. Wilfrid Allan, 1870-1958)，1878 年來華，英國循道會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1907 年參與《聖經》翻譯，1930-1936 年任廣學會總幹事。

蘇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1881-1928 年在華，英國偕我會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1911 年改名聖道公會，1934 年改名循道會) 傳教士。1928 年離開中國，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晚年回英國後任牛

津大學中國語文教授。

李佳白 (Gilbert Reid, 1857-1927)，1882-1892 年、1895-1917 年和 1921-1927 年三度在華，起先是美北長老會傳教士，1894 年因差會不同意其面向上層社會傳教的設想而脫離該會。1897 年起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批准成立尚賢堂，斷續維持到 1927 年。尚賢堂主辦各種中外聯誼活動，還開設學堂、藏書樓和華品陳列所，並邀請不同宗教的人士前來演講和討論，宣揚宗教大聯合思想。

方法斂 (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1887 年來華，美北長老會傳教士，1887 年在濰縣樂道院任教，1905 年接替柏爾根 (Paul D. Bergen, D. D.) 任美北長老會與英國浸信會合建之廣文大學校長，並兼任道學教授，以甲骨文研究享譽國際。

海思波 (Marshall Broomhall, 1866-1937)，1890/1891-1900 年在華，中國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 英國籍傳教士，1900-1927 年在倫敦擔任內地會秘書，1927 年退休後繼續從事文字工作。

樂靈生 (Frank Joseph Rawlinson, 1871-1937)，1902-1937 年在華，美南浸信會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英國籍傳教士，1912 任上海《教務雜誌》編輯，1919 年前後參與大型統計資料《中華歸主》的編輯工作，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國學校部主任。

布魯斯 (J. Percy Bruce, 1861-?)，不遲於 1910 年來華，英國牧師，參與齊魯大學組建，並於 1917-1919 年任齊魯大學校長，後任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教授。

明義士 (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1910-1937 年在華，加拿大長老會差會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傳教士，曾在山東齊魯大學考古與漢學系教書。

有關的三十三部作品之內容按現代學科分類可以分爲歷史、儒學、宗教（佛教及其他宗教）、語言與經濟，儒學和宗教明顯表現爲這些傳教士的論述重點。

## 二、中國歷史

專事上古研究的，有兩部堪稱專業學術研究的作品，一是明義士的《商戈：西元前 1311 年至西元前 1039 年的中國一種青銅時代特色兵器的研究》（James Mellon Menzies, *The Shang Ko: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 weapon of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in the period 1311-1039 B.C.*, General Books,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42），根據殷墟出土的商戈及其殘片，以及各地出土的其他器物上戈的圖形，研究晚商時期的戈。明義士的作品是基於實物考古的研究，蘇慧廉的作品則是利用文獻「考古」還原中國古代「明堂」之面貌。

蘇慧廉《明堂：早期中國王權研究》（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hall of light: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James Clarke & Co., 2002, reprinted; First published in 1951 by Lutterworth Press）匯總中文史料中對「明堂」的敘述，並從比較人類學和古代天文學史的觀點闡釋相關論述，認爲明堂本質上具有天文學特徵，與確定曆法有緊密聯繫，而確定曆法從中國歷史最初階段起就是王室的基本特權。蘇慧廉聲稱此書旨在爲葛蘭言（Marcel Granet）等人在這個領域已有的研究提供更多補充，葛蘭言印證了夏德（Friedrich Hirth）提出的“model emperor lore”（楷模皇帝知識）概念並揭示了中國古老的君王關係。蘇慧廉認爲，此種觀念與目前基於原始社會研究得出的認識頗爲相似，但中國當然也自有其獨特之處。作者撰述此書的根本動機是希望通過對中國帝制起源

的研究而更好地理解「神聖權利」(Divine Right)作為世界上普遍的政治與宗教活動之基礎的作用。二十世紀可謂具有神權統治性質的君主制徹底動搖的時期，先是葡萄牙，然後是中國，接著依次是俄國、奧地利、德國，最後是土耳其。這種現狀促使人們有興趣思考帝制君主關係的起源、成長及其對人類發展的意義。中國作為帝制持續最久的國家，顯然具有典型性，而君王關係被他界定為中國歷史的關鍵詞，用他的話講，就像一棵樹幹，連接起中國文化與實踐的根系與枝葉，研究它可以提綱挈領。所以，他以君王關係為主題，以早期政府宗教、特別是與明堂關聯的部分為切入點。通過對明堂記載的研究，蘇慧廉揭示出明堂的原始形式和宗教目的，也揭示出中國君主制的早期發展，並證明兩者自來聯係緊密。結論是，早期政府宗教主要建基於天文觀測與氣象觀測，注意這些現象的首要原因是對食物和農業生產知識的需要。祭祀的執行者起初不是世襲統治者，而是「聖人」，「聖人」則通常與部落聯盟首領關係密切。

近代史的著作偏愛考慮中國與基督教<sup>1</sup>世界的關係。海思波《中國當前形勢：關於中華帝國道德與精神之宣言試擬》(Marshall Broomhall, *Present-day conditions in China: notes designed to show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claims of the Chinese empire*,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8; First published in 1908)是對中國近期國內及國際形勢的概略介紹，尤其強調基督教的繁榮。李佳白《管窺中國》(Gilbert Reid, *Peeps into Chi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892)談論中國近況及基督教傳教形勢，懷抱基督教必勝之念。蘇慧廉《中國與英國》(William Edward Soothill, *China and England*,

---

<sup>1</sup> 本文出現的「基督教」一詞皆指 Christianity 統稱之意。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是一部近代中英關係史,基於兩次鴉片戰爭而述,第一章從十八世紀的遣使活動和東印度公司開始追溯,有兩章談「文化輸入」,實際是介紹基督教尤其是英國新教的傳教成就,以反駁有些英國人認為只要與中國做生意就行的論調。此書也論及中國改朝易代建立民國,重點是介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中國通史或中國文化概論同樣呈現出基於西方文明與基督教文明進步觀的觀察視角。花之安《歷史之光下的中國》(Ernst Faber, *China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897) 簡介中國疆域與中國歷史,關注中國政治制度中的關鍵因素(政府組織、後妃、太監),儒、釋、道,當前從黑暗走向光明的變化態勢,挑選這些因素是為說明中國傳統如何塑造出一種不符合現代要求的國民性以及中國傳統如何阻礙基督教發展。丁韋良《中國的覺醒》(W. A. P. 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07 at New York b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第一部分是中國各省介紹,第二部分是中國歷史介紹,第三部分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包括中國與各國的戰爭、義和團及新政。附錄一〈在中國傳播世俗知識的傳教士代理機構〉(“The Agency of Missionaries in the Diffusion of Secular Knowledge in China”) 概述新教傳教士為輔助傳教而在中國進行的文化傳播工作,作者在此把中國視為有無窮活力、充滿未來的國家,並非像西亞那般的已死帝國之墳塋,但其贏得未來的關鍵是接受基督教文明以及現代科技文明。

麥高溫《中國的帝國史：中國歷史學家編纂的帝國史》(John Macgowan, *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 being a history of the Empire as compiled by the Chinese historians*,



Curzon Press, 1973; First published 1897, Second published in 1906) 是一部從盤古時代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通史，斷代分章。1905 年寫於廈門的前言評論了中國史家修史之法，也指出研究中國歷史時僅能依靠正史材料之狀況的局限，其中有合理的評論，也有作者對中國史料傳統的偏見。作者說，中國的帝國史 (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 就相當於中國史 (the history of China)，因為它都是帝國授權的歷史學家所撰寫。正史加上孔、孟的作品是瞭解中華民族漫長歷史的唯一可信資料。過去常有知名作家聲稱自己寫了當代史，可是其中常有誇飾之辭、傳說故事或難以置信的宣言，根本不能作為信史接受。作者先澄清自己沒怎麼採用歷史批評法的理由，亦即他只是在介紹中國歷史學家提供的東西，由於他們從未學過歷史批評這門科學，中國也沒有可供從事歷史批評的材料（指久遠時代之書籍或碑刻），所以作者也不敢越俎代庖。此間認為中國缺少碑刻史料多少有點偏頗，也可能是當時的有限條件致使他形成此種印象。在針對正史之外的可靠材料非常稀少之況發完牢騷後，作者也介紹了中國史家的傳統工作方式、保證其秉筆直書的制度約束以及史家的崇高使命感，以表明正史作者提供的材料不應有疑。但麥高溫在此還是忍不住再發牢騷，無奈聲稱，即使對中國史家有很多疑慮，也無法證明他們的錯誤所在，因為這些官方正史是唯一的材料。通觀全書，作者的評論的確很少，不多的註釋亦極少提及資料，多是解釋某個物品或人物。而從作者羅列的參考書來看，他實際上主要依據一些介紹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英文作品，所以此書總體上是一部針對英文讀者的通俗讀物。

蘇慧廉和本恩《中國歷史》(William Edward Soothill & E. Benn, *A history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revised and edited by G. F. Hudson; First published in 1927 at London) 是一部一百頁左右的中國簡史，1950 版增加二十頁（第十四章）論 1927-1949 年間事。斷代分章，但每章命名時提取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第一章是傳說時期（標題〈中國的過去〉），簡略提及伏羲至堯、舜、禹、夏、商的傳說，第二～十三章分別是周（標題〈封建主義與古典時代〉）、秦（標題〈帝制〉）、漢、三國南北朝（標題〈軍閥與混亂的時代〉）、隋（標題〈重新統一〉）、唐（標題〈擴張與詩歌〉）、五代、宋（標題〈中國人與韃靼人：歷史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元（標題〈蒙古人〉）、明（標題〈一個中國人的王朝〉）、清（標題〈巔峰與衰落〉）與民國。由此可見，除了漢代與五代，作者對於各個時代都設立一個標籤性的基本形象。1927 年的序言中，作者提到自己儘量兼顧政治與文化發展，因為這兩者缺一不可。特別提到，中國人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單一民族，實則不然，中國人是許多種族的集合體，它的統一進程時常遭受嚴重干擾。統一體的說法並不被中國的人民接受，但是在獨裁朝代裡，每個最後奪取政權的勝利者都會如此宣稱。中國的文明古老而進步緩慢，由於缺少跨文化滋養（cross-fertilization），它既沒有西方文明那般內容廣泛和高度發展，也不及西方文明古老與深厚。「受限的發展」（arrested-development）主要不是因為中國人不願變化，而是因為與其他可帶來進步的影響力隔絕太深。當前，這個國家急於在老樹上嫁接新葉，但土壤實際尚未準備充分。作者以現代的歷史發展觀剪裁資料，並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通格外感興趣，從秦朝開始每章都有這方面內容，而秦朝這一章出現的是 China 這個名字的由來，認為 Chin 得名於 Ch'in Dynasty，在拉丁文中又轉化為 Sinae，並稱此種說法在亞洲被廣泛接受。對 Sinae-China

由來的此種解釋確實一度廣泛被中外學者認可。

衛三畏的《扶桑及其他東夷考》（S. Wells Williams, *Notices of Fu-sang, and other countries lying east of Chi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881 at New Haven）篇幅不長，是一篇論文的單行本。此文與蘇慧廉類似地表現出對中國與外部交往的興趣，但關注的是中國與東部地區的關係，實為對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中東海諸國部分的英譯和考釋，但補充了許多作者當時對那個地區的認識。

林輔華《契丹的締造者們》（C. Wilfrid Allan, *The makers of Cathay*,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6, third edition）是一部按時代排列的中國歷史名人小傳。據前言稱，此書1908年初版，1925年再版，至今仍無其他類似書籍問世，所以三版，不過此版有擴充內容和基於政治局勢變化而做的修訂。本書旨在讓西方讀者瞭解一些中國名人，這些人分別在政治的、教育的、社會的和宗教的發展上有助於確立中國的民族性，在寫這些人物傳記的同時也寫入中國歷史中最吸引人的一些時期。入選人物分別是孔子，作為「道德改革家」，而算不上宗教導師；孟子，作為「社會改革家」；老子，作為「老哲學家」；秦始皇，作為第一位統一者；諸葛亮，作為「戰略家與政治家」；法顯和玄奘，作為「佛教朝聖者」；李世民，作為「唐朝的真正奠基人」，強調李淵坐上皇位也是靠他；李白和杜甫，作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韓愈，作為「文學王子」；王安石，作為「政治經濟學家和國家改革家」；岳飛，作為「戰士與哲學家」；朱熹，作為「學者和哲學家」；忽必烈，作為「世界的皇帝」；文天祥和陸秀夫，作為「愛國大臣」；朱元璋，作為「乞丐國王」；

吳三桂，作為「人民的將軍」<sup>2</sup>；鄭成功，作為「海盜兼愛國者」；康熙，作為「最偉大的滿族人」<sup>3</sup>；乾隆，作為「征服者」<sup>4</sup>；林則徐，作為「欽差大人」<sup>5</sup>；曾國藩，作為「擁護帝國統治的將軍」；李鴻章，作為「政治家與外交家」；張之洞，作為「學者與教育家」；孫中山，作為「革命者」。從中可見，作者選人的標準和對所選人物之基本特點的認定都反映了外國人心目中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和特質是什麼，與中國傳統的觀點頗有出入，很可與中國傳統比較玩味。

### 三、儒學

理雅各《東方聖書與早期文獻：古代中國》（James Legge, *Sacred Books and Early Literature of the East: Ancient China, vol. 11*,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17）的主體是譯著，包含理雅各翻譯的《書經》、《詩經》、《易經》、《論語》、《大學》、《中庸》、《孝經》，還有理雅各為四書譯本寫的導論〈孔子生平〉（“The life of

<sup>2</sup> 解釋給他這個稱號的原因是他的事跡以歷史書和戲曲的形式廣為流傳，大家都尊敬他。

<sup>3</sup> 引了耶穌會士馮秉正的話盛讚康熙，認為自己也無以復加，概言之就是，康熙精力充沛地管理國內一切事務，在制定政策時仁慈、勇敢、慷慨、明智、積極而謹慎，才華出眾。儘管國力強大，但不願侵略亞洲其他國家。天主教傳教士期待他要改進的唯一事情就是接受基督教，而且他已經懂了基督教的道理，並對其道德性和原則有高度評價，只是政策原因和人類性情的原因妨礙他公開接納基督教。

<sup>4</sup> 強調他擴張領土之外還注重民生，本人好學也博學並因此而器重天主教傳教士，跟從他們學習科學和關於西方的知識，欣賞他們的繪畫，由此他腦中原有的關於外國人的無知和偏見多讓位于真知。

<sup>5</sup> 評價他是典型的中國舊式官員，強烈排外和反對發展商業，雖然他有能力有決心，但因為對外國一無所知又缺乏辦事策略，他被派任欽差大臣是一場不幸。但是他的愛國心和對鴉片之害的認識無可指責，即使英國人也應當對這樣一個人物表示尊敬。

Confucius” )。 <sup>6</sup>更能直接體現理雅各對古代儒學之認識的是理雅各《孔子的生平與教誨》(James Legge,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 Cosimo,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是書分兩大部分, 後一部份是《論語》、《大學》、《中庸》的譯文; 前一部分是五經、《論語》、《大學》、《中庸》、對孔子的介紹與評價。此書最值得重視的是各章中關於這些文獻成書時間的討論, 頗可與一個多世紀之後白牧之和白妙子合著的《論語辯》(E. Bruce Brooks &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一書參照閱讀。第一章討論五經的編纂時間和作者問題。第二章談論《論語》文本形成與固定的時間在漢代, 不能視為是孔子門徒所編, 而且漢代編寫者從諸多材料中篩選出可見的這些, 還提及後世學者熱衷於註解《論語》, 並提供從漢至清《論語》注疏史概略。第三章論《大學》, 指出它是《禮記》中的一章, 東漢馬融所編, 原作者存疑, 但可以肯定是儒學一派的豐碑, 此書歷來被中國作家盛讚。理雅各認為, 「大學」當稱「太學」, 因為它是給皇帝的教材。他還認為, 中國關於智力與品德的正統教導錯得離譜, 讀過此書自會發現, 這部作品並沒有發展出「一個無可匹敵的社會完滿化 (social perfectionating) 體系」, 此書雖然功勞卓著, 卻從不講求邏輯嚴密, 也無意於進行心胸開闊的思想歷程考問, 它只是簡單地把政府認可或符合行為規範的一些萌芽態原則徑自認定為可以使人類走向幸福與賢德的法門。第四章論

---

<sup>6</sup> 書中還有一篇夏德為全書寫的導論〈孔子如何挽救古代文明〉(“How Confucius Saved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介紹與孔子有關的五經和論語, 其內容及來歷簡介, 可信度簡評, 頭四頁專門介紹中國的基本宗教情況及儒學與神的關係問題。但夏德的很多觀點顯然與理雅各相左。

《中庸》，指出它也是《禮記》中的一章，劉向、馬融和慶咸（Ch'ing Heuen）也對於它的成文都有重大貢獻。《中庸》的內容世稱出自孔悝之手，雖然中國作家都這麼說，但缺乏內在證據，所以理雅各順便介紹孔悝生平並辨析相關敘述之真偽。理雅各對《中庸》評價不高，認為它是不易理解的書，作者不闡明他的基本格言，使讀者面對文句的模糊性時不知所措，作者顯然要滋長其同胞的驕傲，把他們的聖人置於「上帝」（God）或被崇拜者之上，同時它反對基督教。於是，當基督教在中國日漸流行後，此書就成爲一個證據，證明中國人的先祖們憑自己的微末智慧根本不懂得上帝和他們自身。

第五章介紹孔子生平，分析孔子贏得的地位和影響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首先，他被視爲古代文化遺產的保管人及黃金時代行爲準則的實踐者和解說者；其次，他的第一批門生和再傳門生對他的推崇。理雅各在介紹孔子的自評和學說主旨後，特地討論孔子的政府觀，認為孔子的理論在一個小家小族內（原始簡單的社會）管用，但當它被用於一個大帝國後，弊端明顯，這個帝國的思想發展從此停滯，政治軀體（body politic）龐大，思維卻如孩童，如今這個國家古老得只剩下老態龍鍾（Its hoary age is but senility）。此外，孔子的觀念中不包含同其他獨立國家的交往，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要做這種事。與此前耶穌會士塑造的形象相反，孔子的思想根本沒有超出人倫而達致神人關係，斷章取義地將他的兩條格言與基督教觀念牽合起來並不對，包括前人津津樂道的孔子之仁與基督教之慈善的相近性也不對。

理雅各《孟子的生平與著作：附論文與註釋》（James Legge, *The life and works of Mencius: with essays and notes*,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6; First published in 1875 at

London），全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三章，分別介紹孟子的作品、孟子的生平與思想，並附錄荀子《性惡》和韓愈《原性》譯文，還介紹楊朱和墨翟的思想。對楊朱，依據孟子提供的資訊；對墨子，主要譯介《兼愛》篇。其中包含理雅各本人將中國思想與宗教觀念比較的評論。第二部分翻譯《孟子》的〈梁惠王〉、〈公孫醜〉、〈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七篇。

理雅各另有一部《中國人關於上帝與鬼神<sup>7</sup>的觀念：附考察對文慧廉論正確以中文翻譯 Elohim 和 Theos 之文的辯護辭》（James Legg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William J. Boone, D.D.,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1852 at Hongkong*），是「譯名之爭」中同文慧廉（William J. Boone）為代表之「神派」進行論戰的產物。此文從討論 God 的中文譯名問題入手談論對中國古代宗教觀的認識，算不得專論儒學，故而將在另文相關主題下討論。

花之安的論文〈傳教士對儒學的看法〉（Ernst Faber, “A Missionary View of Confucianism”），附於其《歷史之光下的中國》書後，比較儒學與基督教的相似之處，敵對之處，儒學比之基督教的不足之處。相似處在於提倡道德、相信奇跡是神意的顯現、相信神意及物質世界之外的不可見世界，即使理學也只是對神意有不同的解釋，並非不同於先秦儒家。對立處主要在於，儒學知道上帝卻不能只相信一個上

<sup>7</sup> 理雅各在書中明確說（如 p.25），自己用 spirits 來翻譯中文的「神」，而此詞所指是複數的諸鬼神。所以標題譯為「鬼神」，譯為「神靈」也可以，但不能譯為「精神」。

帝、崇拜物體之霸和祖先之霸、講風水、給皇帝太高權威、允許血腥報復。儒學缺乏而基督教完備的主要是關於上帝的知識、品行及生活要求。

布魯斯《朱熹和他的老師們：朱熹及宋學導論》(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MS Press, 1973; First published in 1923 at London by Probsthain & Co.)以介紹朱熹的思想和生平為主，也介紹了理學興起的原因和早期理學家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所用材料有《朱子年譜》、《歷代名臣言行錄》、《尚友錄》、《子書二十三種》、《朱子語類》、《近思錄》、《御纂朱子全書》、《正誼堂全書》、《宋元學案》、《二程全書》、《二程遺書》、《二程外書》、《二程粹言》、《御制性理大全》、《御纂性理精義》、《理學宗傳》，理雅各翻譯的四書、《尚書》、《詩經》，*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中收錄的《易經》和《禮記》譯本，作者自己翻譯的朱熹《性理》。介紹朱熹思想時分三部分：朱熹關於宇宙的理論，朱熹關於人性的理論，朱熹哲學中的一神論內涵。一神論問題將以另文進一步介紹。以儒學發展的角度而言，作者認為，相較於四書五經著眼於論理教導而中國民間流行宗教信仰這兩點，理學是探討中國人哲學概念的重要知識。當前的中國儒學正是流傳了七百年的朱熹儒學（而非孔子儒學），它同時具備倫理體系和形而上學概念，而此點最近才獲漢學界承認。

#### 四、佛教

佛教類有五部。其中畢爾的兩部是一組，先是他 1871 年出版的部分佛教文獻選譯，《中文佛經系列》(Samuel Beal,



*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Trübner & Co., 1871) 兼及略述中國佛教史。導論介紹編書緣起——最近三四十年佛教史和佛教哲學研究興起，但漢文佛教典籍卻未被利用，並概述漢文佛教典籍的價值。全書大體按時間分為五卷，每卷下分數個主題，每個主題下摘錄相關的佛教文獻加以翻譯，同時每卷起首先介紹和評論將要出現的翻譯文獻，詳略不等。其中第四章專門列出一個「秘教時代」，介紹以阿彌陀佛信仰為主的佛教神秘主義內容。全書以內容分類為主，缺少明確的時間指示，雖然有意圖表現在什麼時期發展出什麼東西，但未能清楚展示，似乎缺少對佛教史的全面研究。間或對個別文獻的出現時間和漢譯時間有介紹與論述。導論中顯示，作者更關心佛教向東和向西的傳播與影響。選譯的佛教文獻有二十部，分別為：仁潮《法界安立國》、智顛《小止觀》、《沙門日用》、王勃《成道記》、《千手千眼大悲心懺》、無後子《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四分戒本》、《佛說四十二章經》、《大佛頂首楞嚴經》、《首楞嚴咒注釋本》、《準提咒》、《佛說阿彌陀經》、《金剛經》、《大雲輪請雨經》、《大般涅槃經》、《妙法蓮華經》（江都蓮久寺印）、《大字普門品》、《淨土文》、《合集準提彌陀儀釋集》。

繼而是畢爾 1876 年成稿的對萬曆年間（十六世紀末）編輯之「北藏」（大明三藏聖教）佛經的目錄與提要，《中國和日本熟知的佛藏目錄及提要》（Samuel Beal, *The Buddhist Tripitaka as it is known in China and Japan: a catalogue and compendious report*,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876）。「北藏」於 1679 年在日本翻制，並附御制序言在 1681-1683 年間頒行。日本政府將這套含日文註解的佛經贈與倫敦的印度公署圖書館（the Library of the

India Office)，所以作者應邀翻譯書目。此套佛經含一百零三帙／函，每帙平均有二十卷，因此總計超過兩千冊。作者除了把佛經的漢文題目寫以拼音並作內容提要，還簡要指點為這些書籍編目的方法，提出四種方法，最後確定一種可採行的方法是，給一百零三帙從 1 到 103 編號，同時在每一帙下附註函內卷冊的內容以及名錄。如此可以通過兩步檢索找到書，又不會搞亂原書的擺放順序。前言附一封大約是給圖書館館長的信，說明研究這些佛經對於瞭解中國和日本宗教史的意義。書末附一篇作者發表于 *Asiatic Researched, Volume XX* 的論文，文中以舉例的方式進一步介紹這批佛經的內容和研究價值，特別在開篇提到這批經文體現的是漢傳佛教的面貌，用它來瞭解古代佛教的規條就不大可信。

艾約瑟的《中國佛教：歷史的、描述的與批評的》（Joseph Edkins, *Chinese Buddhism: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Routledge, 2007），1879 年首版，1893 年修訂再版，也許算是傳教士作品中首部真正的中國佛教史，但不按時間敘述，也無系統性，作者選取自己感興趣的佛教教義和佛教影響於中國社會的方面而論，因此更應視為作者對中國佛教的觀念展示。導論和兩版序言提出為什麼要重視佛教研究、中國佛教概況以及歐洲學者的佛教研究進展。第一～四章是佛陀傳，第五章介紹印度北派宗師，第六～八章介紹中國佛教史和流派概況，第九～十六章介紹佛教教義與儀軌，第十七～十九章介紹佛教文獻並含兩篇重要經文的翻譯，第二十～二十四章論佛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這部分尤其體現作者的基督徒立場，第二十五章評論中國佛教徒運用梵文的情況與佛經漢譯問題，第二十六章介紹歐洲幾部研究佛教的作品。

蘇慧廉《中國佛教術語詞典：附梵文與英文術語對照及梵文—巴利文索引》（William Edward Soothil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Munshiram Manoharlal, 2005, reprinte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second published in 1960 by Curzon Press) 是他執教牛津之後編制的一部工具書，將中文佛教術語英譯，並包括梵文對應詞彙。字典按漢字筆劃排序：第一級排序是全字筆劃，筆劃相同的按部首作第二級排序。為此，文首提供了一張部首排序表，以及部首不易確定的難檢字筆劃排序表。事實上，此書向英國提供了中文字典的檢字法。文末附梵文—巴利文索引，對於並非來自梵文—巴利文的術語，則另附一份西文索引（有藏文拼寫、漢語的拉丁拼寫、還有其他語言的拉丁拼寫）。該辭典參考書包括：（1）十世紀法雲編《翻譯名義集》，蘇慧廉 1921 年在牛津博德利圖書館發現；（2）Stanislas Julien（儒蓮），*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1861；（3）Monier William（莫尼爾·威廉姆斯），*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4）Eitel 的著作；<sup>8</sup>（5）織田得能《佛教大辭典》；（6）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十六卷）和《佛學小辭典》（一卷）；（7）一部日—梵—法佛學辭典 *Hôbôgin*。所以，作者的工作仍是以綜合前人成果為主。

李提摩太的《中國四十五年回憶錄》（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BiblioLife, 2009）首次出版於 1916 年，是李提摩太在中國的見聞錄，述時政較多，也常論基督教傳教狀況，全書顯示出對中國人精神狀況的特別關注。關於佛教的部分（主要見於第十三章和第十九

<sup>8</sup> 蘇慧廉未言細節，可能指 Ernest John Eitel,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being a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in Pali, Singhalese, Siamese, Burmese, Tibetan, Mongolian and Japanese*.

章)嚴格來講算不上學術意見,而是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對於異教的觀感。在第十三章,作者認為佛教就是迷信。但在第十九章,作者講自己翻譯了一本佛教書籍,後又與日本佛教人士接觸,結果發現佛教有很多類似基督教之處,尤其是儀軌。但是作者沒有對自己前後的不同印象(或者民間佛教與知識分子佛教的關係)有任何評論。

## 五、民間宗教

佛教而外,中國的民間宗教也是這些傳教士很關注的話題。但不同的是,當時對佛教的關注已經表現出學術性興趣,對民間宗教的認識卻仍然有濃厚的基於基督教立場的評鑑。在這方面很典型的是麥高濶的兩部作品《中國人生活面面觀》(John Macgowan, *Sidelights on Chinese life*, Paul-Trench-Trübner, 1907)和《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John Macgowan, *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09)。它們都屬於中國風情錄,其中包含了對中國各種民間宗教和崇拜行為的介紹,對於西方人瞭解該主題而言有知識基礎的作用。《中國人生活面面觀》一書有十六章,分別介紹中國人性情、家庭生活、孩童生活、宗教力量(風水、祖先崇拜、觀音崇拜、宿命、來世)、僕人的品行和工作方式、中國人的適應性和頑固性、娛樂、農民、一座城市(可能是廣州)的基本佈局和生活面貌、對死亡的認識和對待死者的方式、中國人生活中各迷信面向、學校和教學、官員、商販、由於沒有正確的宗教指導而存在的各種道德缺失、在中國一次長途旅行的記錄(卻沒說從哪裡到哪裡)。其中第六章〈中國的宗教力量〉(“Religious Forces in China”),描述各種常見的宗教崇拜行為,包括

佛教崇拜。作者認為迷信是中國歷史發展中阻礙該民族進步的最強大因素，但是如果他們認識到福音的真理，他們就有能力掌握最智慧的宗教。末尾一段還稱讚寺院周圍的景色很宜人，尤其是太陽照耀之時，這時連偶像們也不那麼面目可憎，卻仿佛捕捉到了白日的精神。第十章〈幽冥地府〉（“Hades, or the Land of Shadows”）介紹中國人對陰間的認識，重點是基於基督教立場評價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無知。他評論說，孔子不談死亡問題，他顯然仔細考慮過該問題，但發現其中充滿他無法理解的神秘性。自孔子始，中國人一直在死亡問題上處於無助狀態，各地的墳墓都建得很醒目正是此種狀態之明證，中國人墓碑銘文的內容也表明他們對於死者去向何方一無所知。但是中國人中也不乏有人試圖探索死後的秘密，所以構造出一個「陰間」，但這個陰間只是人間現狀尤其是帝國機構的地下對應物。此外還有源自佛教並於民間廣為流傳的一種地獄，其中閻王要對死者進行審判，決定其來生去向，於此附帶介紹佛教的地獄賞罰與來生輪回果報。作者說，以上這些都是試圖窺透死後及未知未來的令人可憐的嘗試，因為其中都不包含來自上帝的啓示。第十一章介紹風水師、江湖郎中、說書人、鬻媒，稱這些職業人皆為不務正業的騙子。作者提出一個問題，在中國為何會讓這些地位低下、品行不端的人成為精神活動的領導者？他的答案是，因為中國人在各種崇拜活動中，從不要求崇拜者在心中或生活中懷抱真正的善念或改過之念，人們只求消災，只求有力量者庇護。第十五章重申第十一章中的一些評論，並把中國人的一些惡習都與此關聯，如賭博和嗜好鴉片，最後說只有基督教可以拯救這個邪惡叢生的國家。

《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相對前書而言，比較偏重於對中國制度與文化的介紹，但也有很大篇幅記錄社會生活。一

共二十四章，分別是國家概述與法律、統治方式、軍隊體系、科舉制度、古代經典、學校、祖先崇拜、風水、偶像的代言人、城隍廟、山寺、刑罰、私刑、醫生與醫治、錢幣與借貸、戲曲、某城市漫步印象、水鄉人的生活、家庭生活、農民生活、驛道和小路、乞丐、面子、中國人生活總評。第七章〈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補前書之缺，介紹作為中國人最基本最普遍之信仰的祖先崇拜，其來歷、其中包含的對靈魂的認識、祭拜祖墳的程式、祭拜家中牌位、秋天（可能指秋分日）合族祭祖的規矩。作者認為，中國當前祭祖的情況顯示，宴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環節，但是在整套先人靈魂崇拜中，並不存在生者相信未來能與死者再相見的信念。第八、九兩章分別談風水師和靈媒，與上一本書類似。

此外還有李提摩太的《中國月令神》（Timothy Richard, *Calendar of the gods in China*, BiblioLife,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1906）介紹中國人一年各月禮敬各種神靈的日期，包括對這個神靈的基本介紹，相當於一份中國人的「瞻禮單」，佛、道、儒及其他神靈無所不包。主要依據清代秦嘉謨的《月令粹編》（二十四卷）編譯，並補充進盧公明《中文詞彙及手冊：依據官話的羅馬拼音字編排》（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中的一些內容。導論是一篇關於中國民間宗教的概論，也表明了對待中國「萬神殿」的態度：作者認為這是中國當前心智、道德與精神狀況的準確白描，也解釋了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階段，事實與幻想毫無辨別地混為一談。中國人就處在這種事實與幻想交織共處的狀態（如同古代希臘），此種狀況下只有對於個別的神與人之差別的認識，沒有對於真神的認識，個別的神被認為是強大些的人。考慮到與中國人和平相處的現實問

題，對中國人要以和緩的正面教導為主。作者還談論對於人類進步而言宗教與德性的關係：大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儒教、佛教和道教都有倡導人類進步的特點。儒學強調政治和群體倫理，遠離想像之物，但是卻不甚重視爲了利他而自我犧牲這一點，這是對人類進步而言的缺陷。最後，作者介紹中國宗教中幾個突出要素——輪回、齋戒、沐浴——的意思及適用場合，將之與基督教中的類似情形比較，並對於各種宗教信徒在世界各地的數量分佈作粗略統計。

## 六、三教總論或宗教通史

樂靈生《中國人關於至高存在的思想》（Frank Joseph Rawlinson, *Chinese ideas of the Supreme Being*,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7），1926年撰於上海，自稱不算一篇專業論文，而是過去幾年講演材料的總結。作者希望讓人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基督教關於真神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早就是中國人的本有觀念，但是至今還沒有一個中國思想家想到要把中國思想中關於至高存在的內容綜合論述。所以，作者承擔此職，既提供當今中國思想中關於至高存在的觀點，也提供古典文獻中包含的不那麼爲人所知的此類見解。本書是與一個普遍概念（指 God）關聯之術語和思想的討論，採用各宗教相比較的方法，既要避免過度穿鑿中國思想而墮入混合主義想像，又要避免過度將中國思想非宗教化從而損害中國傳統中那種具宗教價值的至高性觀念。

波乃耶《天與他的宗教，或，中國的宗教面向：中國宗教系列講演錄》（James Dyer Ball, *The Celestial and his religions: or, The religious aspect in China. Being a series of*

*lectures on th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1906 by Kelly and Walsh, Ltd.) 介紹中國本土宗教和歷史上曾經在中國出現過的幾大宗教，包括伊斯蘭教、猶太教、中古景教<sup>9</sup>、明代天主教和當代基督教新教，解析中國人的宗教狀態以證明新教傳教士工作的必要性和難易狀況。對中國本土宗教的強調點依然是古代對真神的認識、祖先崇拜與中國人對靈魂的認識、孔子學說的道德性特徵以及佛道的迷信特徵。

蘇慧廉《中國的三教：牛津演講集》(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大約是首部西方人以現代觀點全面分析中國三教的著作。第一～四章介紹儒、釋、道的基本歷史及三教的關係，佛、道對儒普遍持容忍態度，儒士則常嫉妒二教並不惜迫害之，然而從沒有過像歐洲那麼嚴厲的宗派迫害事件。這當歸因於儒學的哲學特徵強於宗教特徵，或者它明智到能看出迫害行為的愚蠢。三教在中國並非彼此排斥，它們的互補性強於敵對性。書中解釋「教」與「道」兩個詞在中國的含義，以及當前「宗教」一詞的所指。指出儒和道是中國的本土宗教，西元前六世紀之前，它們沒有明確分為兩派，只是由於孔子和老子才使它們分離為兩派，當時還出現了第三派——巫術派（指陰陽、五行、神仙、方伎），它後來與佛教混合，成為平民中的流行宗教。後來，儒教逐漸被視為國家宗教，但佛、道也被認可。在第四章專論佛教時，對佛教的介紹很淺顯並充滿偏見，重在比

<sup>9</sup> 由波斯教會傳入的基督教。中文學界至今仍習慣稱之為「聶斯脫利教」或「聶斯脫利派」，但這種稱呼從基督教史和神學上考察均為錯誤稱呼，西文的澄清之作已不少見，可參見吳莉葦，〈關於景教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反思〉，《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1年9月），頁95-106。



較看似與基督教相似的概念之內在不同，然後羅列基督教能夠提供哪些佛教所不能提供的東西。第五～十章就基督教關心的命題分析中國宗教，即，依循上帝的概念、人與神靈的關係和接近神靈的途徑、宇宙論、靈魂認識與祖先崇拜和來世觀、道德理想以及罪與其相應後果等此類命題來解析和評價中國宗教。作者認為孔子時代之前是理解中國人宗教觀念的關鍵，後來則備受佛教影響，這看似大體遵循耶穌會士設定的道路，但實際上差異不小。第十一～十二章區分官方宗教與私人宗教。最後四章（第九～十二章）都包含對中國人實際信仰狀況、品性、待拯救程度的評論。全書基本著眼點是，在理解中國宗教的各個方面之後，思考如何最有效地在中國去偽存真、以較少的破壞完成上帝福音的建設。

樂民樂(Walter James Clennell)是外交官，但其作品《中國宗教的歷史發展》(Walter James Clennell,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1926; First published in 1917)係中國古代宗教通史，值得一併考慮。此書介紹中國的儒、釋、道以及在中國發展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有關明清天主教會的一章評論天主教會不能勝任在中國傳教，無論是傳授知識還是傳授宗教，都使用當時在歐洲已經被批評的老套方法。知識介紹之外，此書的主旨是中國人尚不認識宗教，基督徒需憐憫以及耐心教導，教導宗教的同時還要教導以現代思想。第一章和第一版序言充分表達出此點：中國人的三教區分遠非西方式的宗教區分或教派區分，而是彼此滲透，理解中國人宗教狀態的關鍵是理解祖先崇拜，因為新神的來歷和禮儀的來歷都以祖先崇拜為基礎。中國人最初的各種事死禮儀並未違背上帝律法，因為這些行為是純樸心意的自然表達，自然之性尚不識善惡或道德，所以不能指責他們不道德。只有歐洲人

-基督徒是（宗教及文明的）先知先覺者，知道何為錯與罪，所以歐洲人要心懷仁愛教導愚昧者，並努力改變這個不完美世界，哪怕眼下的中國在各方面都不給人以樂觀景象。

海思波的《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個被忽視的主題》（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Subject*, Gorgias Press,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1910 at London by Morgan & Scott, Ltd.）是一部難得的涉及中國穆斯林的作品，前半部分介紹早期伊斯蘭教及穆斯林入華史，重點在討論廣州的唐代遺跡和西安清真寺的幾塊碑刻，尤其辨析西安化覺巷清真寺一塊表明「天寶元年建寺」之碑係明代偽造，與後來以陳垣為首之中國學者的同類研究遙相呼應。後半部分則介紹作者在華時期中國穆斯林的生活狀況、人口、地理分佈和信仰狀況。

## 七、其他

經濟類的有兩部，一是艾約瑟《中國的銀行與物價》（Joseph Edkins, *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General Books,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05），寫作時間未提供，但所涉及的內容最晚似為 1899 年。此書介紹中國十九世紀的錢莊和銀票，也有一點涉及古代的交子，同時介紹古代政府的稅收與權買制度。另一部是麥都思的《中國內地一瞥：絲茶產區旅行紀》（Walter Henry Medhurst, *A glance at the Interior of China: Obtained During a Journey Through the Silk and Green Tea Districts*, Adamant Media, 2005）此書包含三部作品，分別寫於 1845 年至 1850 年。第一部是絲茶產區（蘇松、杭嘉湖、徽州、江西婺源一帶，略及安慶）旅行紀，介紹這些地方地理概況與沿革，蠶桑與茶葉生產概況，對絲蠶更重視，

從養蠶到紡織的過程介紹及圖示。第二部是徐光啓《農政全書·蠶桑》中之〈養蠶法〉、〈栽桑法〉、〈蠶事圖譜〉、〈桑事圖譜〉的英譯並附圖，但是〈桑事圖譜〉一章的〈織紵附〉部分沒有翻譯。第三部是上海及其周邊地區概述，作者聲稱是《大清一統志》中〈松江府〉部分的摘譯，但與《嘉慶大清一統志》相關部分比較，並不相像，可能是從《松江府志》中選譯，外加作者自己增補之筆，其中還涉及基督教的內容。

語言文字類的有兩部，一部是艾約瑟《中國在語文學中的位置：試論歐洲語言與亞洲語言有共同起源》（Joseph Edkins,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1871 at London by Trübner & Co.）包含了漢語語音發展之歷史進程的研究，也體現十九世紀的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成果，但其主旨與十七世紀初接觸中國語言和文字的歐洲人一樣，試圖基於聖經觀念論證人類文明有共同起源，人類歷史統合於聖經之中，天下語言原是一家，中國人在基督誕生前兩千年自西方移民而來，沿途所經之地的語言特徵仍殘留在漢語中。

方法斂的《中國早期書寫》（Frank H. Chalfant, *Early Chinese writing*, Nabu Press,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06 at Pitsburgh by Carnegie Institute）則是更具有「漢學」意味的中國文字研究。作者在山東傳教期間便致力於研究中國考古學，尤其是古代文字，試圖厘清當前書寫符號的起源。這部小冊子分四章。第一章是包括甲骨文在內的中國文字研究，在表音和表意這個兩分體系框架下定位漢字是表意文字的典型代表，漢字包含表意的努力，字部（字根）對一個字所指的意義來說是決定性的，也論及漢字的聲旁構成和漢語的

音調問題。作者還評論甲骨文有象形文字特徵。文字的流傳方式，古代寫在什麼東西上，什麼時候有了字典。關於中國文字的起源，限於在中國傳統下解說，未涉及與埃及文字的關係問題。以清單方式畫（寫）出 403 個字從最初形式到現代形式的演變過程，包括釋義。評論當時很流行的威妥瑪-翟理斯拼音，指出其體系的構成亦即選用什麼樣的字母拼寫代表漢語音節，既具有偶然性，也肯定受到其他人提示。第二章〈說文注釋〉，主要是列舉眾多字例比較《說文》中的寫法與當前寫法，包括釋義。第三章英譯周武王時代一篇宣佈散宜生封地「散邑」的青銅銘文，附原文及作者本人的現代漢字對應。第四章介紹 1899 年起在朝歌城遺址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有圖樣，附天干地支的字形演變表。

通過以上調查，可以看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這批新教傳教士兼漢學先驅們的關注點有幾個鮮明特色。首先，傳教士的經歷使他們對歷史上曾經引起西方人爭議的中國宗教問題格外關注，比如耶穌會士時代的兩個著名議題「祖先崇拜」的宗教性質和先秦文獻中的「上帝」，依然是這個時代漢學家們傾注大量精力的議題。其次，新教的神學觀點本來就與天主教不同，包括對至高神的認識，這種差異也反映在本文涉及的漢學著作中，所以這批傳教士漢學家在繼承耶穌會士所關注命題的同時，有不少人也超越了當年耶穌會士的認識，而針對中國傳統觀念中「至高神」概念是否存在以及與基督教至高神有何關係這一點紛紛進行廣泛和深入的探索。第三，在這種探索中，二十世紀一些新的宗教理念和宗教社會學觀念被引入對中國問題的解析，同時佛教和民間宗教也正式成爲宗教研究的議題。而且在非關宗教的論著中，歐美新的學科關注點——如考古、經濟、政治外交關係、國家形態與國家起源等論題——也呈現在研究中國的視野

中。所有這些都體現出，傳教活動、文化交流活動、學院派研究在現代社會的初階已經於一群人身上互動交錯，這些前傳教士的個人經歷和他們的思考都可以體現出特定時代漢學研究典範的特色，而上述諸作品中涉獵的許多問題都值得上紹明清之際、下延當今之世以作更加深入之探討。然而這些問題的分析限於篇幅而無法在本文展開，容日後以另文續論。

## 引用書目

- Allan, C. Wilfrid. *The makers of Cathay*,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6, third edition.
- Ball, James Dyer. *The Celestial and his religions: or, The religious aspect in China. Being a series of lectures on th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1906 by Kelly and Walsh, Ltd.
- Beal, Samuel. *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Trübner & Co., 1871.
- Beal, Samuel. *The Buddhist Tripitaka as it is known in China and Japan: a catalogue and compendious report*,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876.
- Broomhall, Marshall.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Subject*, Gorgias Press,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1910 at London by Morgan & Scott, Ltd.
- Broomhall, Marshall. *Present-day conditions in China: notes designed to show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claims of the Chinese empire*,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8; First published in 1908.
- Bruce, J. Percy.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First published in 1923 at London by Probsthain & Co.
- Chalfant, Frank H. *Early Chinese writing*, Nabu Press,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06 at Pitisburgh by Carnegie Institute.
- Clennell, Walter Jam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1926; First published in 1917.

- Edkins, Joseph. *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General Books,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05.
- Edkins, Joseph.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1871 at London by Trübner & Co.
- Edkins, Joseph. *Chinese Buddhism: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Routledge, 2007.
- Faber, Ernst. *China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897.
- Legge, James.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William J. Boone, D.D.*,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1852 at Hongkong.
- Legge, James. *Sacred Books and Early Literature of the East: Ancient China, vol. 11*,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17.
- Legge, James.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 Cosimo,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 Legge, James. *The life and works of Mencius: with essays and notes*,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6; First published in 1875 at London.
- Macgowan, John. *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09.
- Macgowan, John. *Sidelights on Chinese life*, Paul·Trench·Trübner, 1907.

- Macgowan, John. *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 being a history of the Empire as compiled by the Chinese historians*, Curzon Press, 1973; First published 1897, Second published in 1906.
- Martin, W. A. P. *The awakening of Chi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07 at New York b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 Medhurst, Walter Henry. *A glance at the Interior of China: Obtained During a Journey Through the Silk and Green Tea Districts*, Adamant Media, 2005.
- Menzies, James Mellon. *The Shang Ko: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 weapon of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in the period 1311-1039 B.C., Tennessee, Memphis: General Books,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942.
- Rawlinson, Frank Joseph. *Chinese ideas of the Supreme Being*,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7.
- Reid, Gilbert. *Peeps into China*,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892.
- Richard, Timothy. *Calendar of the gods in China*, BiblioLife,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1906.
- Richard, Timothy.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BiblioLife,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1916.
-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 Benn, E. *A history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revised and edited by G. F. Hudson; First published in 1927 at London.
-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China and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2005, reprinte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second published in 1960 by Curzon Press.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The hall of light: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2002, reprinted; First published in 1951 by Lutterworth Press.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Williams, S. Wells. *Notices of Fu-sang, and other countries lying east of China*,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1881 at New Haven.

## **Traversing between missionaries and Sinologists: An overview of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 of Fin-de-Siècle Work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y Sinologists**

**Li-Wei Wu**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of the valuable English-language work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to China which are housed in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ibrar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ranch that were acquired under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inology Research” project. These books were selected because they were written by missionaries who went to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nd were also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inology. Although the number of works included in this overview is small compared to the whole collection, they represent the pioneering work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This paper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eatures of Sinology in the fin-de-Siècle.

**Keywords:**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inology,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